

清华园内外的往事

作为久居北京 80 年的居民，我多次去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修建的三山五园，清华园就在其中。我到清华后有不少疑问：清华名人中还有满族吗？20 世纪 30 年代没有公共汽车，从城里怎么去清华呢？“民以食为天”，我还在清华园边种过京西稻。

我所知道的 200 年前的清华园

清华的校史可追溯到 1909 年 7 月，游美学务处就在我就读的中学——北京二中所在的与内务部街南相邻的史家胡同。1911 年 3 月，游美学务处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我到过原址，可以说这里就是清华的发源地。1909 年 9 月 4 日至 11 日，清华招考第一批学生，其中就有后来的校长梅贻琦。这个时间，与 70 年后——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参加的全国第一次“托福式”考试的时间也惊人的相同，不过我们只考了两天。一直学俄文的我以 56 分考取，成为改革开放后出国访学的首批人员。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不免想起清华之源——游美学务处。

1909 年 9 月 28 日，宣统帝批准外务部、学部奏折，同意将内务府所经管



■ 清华园“工字殿”变工字厅，现在是校机关所在地

的清华园旧址约 450 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909 年 12 月，在清华园兴建游美肄业馆，圈筑校围墙、建筑校门，并修缮工字厅和古月堂。1911 年建成了“清华学堂”，1925 年改称“一院”，后改称“同方部”；高等科宿舍 1925 年改称“二院”；中等科教室和宿舍 1925 年改称“三院”，校医院、美籍教员的住宅小洋楼叫“北院”，现已拆除。

1909 年通过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规定：“津贴在美自费生以境况实在困苦，功课实有成绩者为限。”“至多者每年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70 年后我是访问学者，在法国拿象征性工资，每月 3000 法郎，上交使馆负担一个公费留学生，每月支出约 800 法郎（合 500 美元）——居然是当时一年津贴的最高级别。

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起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于 150 年间精心营建的“三山五园”的圆明园中，位于北京西北郊。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建成了“熙春园”。道光二年（1822 年）将

熙春园分为西、东两园，西园以原熙春园的主要建筑为中心，名近春园，赐给了四子奕訢（即后来的咸丰皇帝）。东园以工字厅为中心，仍叫熙春园，赐给皇五子奕詝。咸丰皇帝奕訢继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亲题匾额挂在工字殿宫门上。明代也有清华园，但在今天北京大学西校门外，为明万历年间武清侯李戚的花园。

道光、咸丰年间，近春园（在学校西大门内）主要由两组建筑构成。小湖水南边的一组叫“前所”，位于现清华大学游泳池北岸，大宫门为三楹，院内为多重大四合院。“后所”在湖中的岛上，大宫门为三间，宫门内院落宽阔，东西各有游廊八间。院中有多株古松，浓荫遮地。据清吴振械《养吉斋丛录》所记，园内有松簧馆、得生轩、对云楼、藻德居、竹净室诸榜额，均为康熙御书，现都已不复存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近春园因紧邻圆明园也被焚毁。清末，清华学堂于废墟和荒岛上修建而成。学校于1980年在荒岛上辟建群芳圃，1982年开始大修，疏浚环池，初具规模。学校在岛北侧立碑一通，碑正面书“近春园遗址”五个大字。1913年春，近春园亦并入校园。1927年夏，朱自清夜赏荷池，撰有名篇《荷塘月色》。岛四周环山，在岛南端濒临水面建敞宇一座，名曰“临榭”。岛上树木成林，散置峰石，在北山边立有我国著名历史



■ 工字厅门前的石狮子，是原物的艺术夸张

学家吴晗先生半身白石塑像一座。

熙春园在近春园东，清华园中以著名的“工字殿”为主要建筑，院前空间宽阔，大宫门三楹，门额上咸丰皇帝手书“清华园”。工字殿始建于乾隆初年，殿前有草坪，门前摆置汉白玉石雕制石狮一对。再前东西建有小院两处，东院门三楹西向，院中有倒座南房五间；西院门三楹东向，院中有倒座南房五间，北开随墙门；西部辟小院一，门西向，折而北有短垣一道。进工字殿宫门有抄手游廊三十间，可达工字殿前厅七楹，出前厅后门步工字廊可达后厅七楹。形似“工”字，现在是清华校领导和行政机关所在地。

厅后建石白月台一座，四周围以白石雕栏，台北有荷塘。驳岸四周，散置峰石，池向西延展，岸东置土埠石假山一座，山势盘谷曲折逶迤，确为佳构。山旁有亭，名曰“迤东亭”，为单檐四角。1978年，为了纪念著名爱国学者、散文家朱自清先生逝世30周年，清华大学将“迤东亭”命名为“自清亭”。1986年，全校师生又在荷花池北岸，竖立朱自清先生汉白玉全身坐像一座。西北有峰石迭山，名曰“观瀑”。昔日这里有人工小瀑布，瀑布水从北大河修闸拦水引注，至今还遗存一块提落闸板的条石。为当年山后的小型水库提供瀑布用水时，闸提闸落，水降水升。历经200年变迁，只留下文字的记载。

工字殿后门额上题“水木清华”。“水木清华”一词出自金代诗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围曾阿。日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写出了当年的自然生态状况，比今天修复的环境更富诗意。

工字殿后门的对联为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礼部侍郎殷兆镛撰写，上联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下联为“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后经多年修复，曾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子称为“天子堂”，但不是“仙居”，仍为“凡境”，不过百年来汇近20万东西南北人才，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后门外为汉白玉石平台，台前有一池水，荷花茂盛。

为清华发展做贡献的满族人

清华园就在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营造的北京西郊三山五园中，是在京满族经常游览的地方。清华大学建立后，满族来者大减，但仍有一些，

且做出贡献。

那桐（1856—1925），满族镶黄旗人，是叶赫那拉氏族裔，慈禧的族人和亲信，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1911年辛亥革命后，那桐曾短暂出任清华学堂校长，受皇命题写清华园校名。



■ 那桐（1856—1925）

我父亲吴恩裕（1909—1979），生于辽宁省西丰县，满族正黄旗人，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红楼梦》研究专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毕业。1936年公费留学英国，入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国际社会党理论鼻祖、“人权理论”提出者、曾任英国工党主席的拉斯基教授，研究政治思想史。1939年至1946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6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曾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及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政治系教授等职。1954年起致力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研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 吴恩裕（1909—1979）

启功（1912—2005），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启功与我父亲同是满族，都在大学工作。父亲虽留学，1936年即为教授，但与“无学历”、小他三岁的助教相交，在20世纪30年代是少见的。他们工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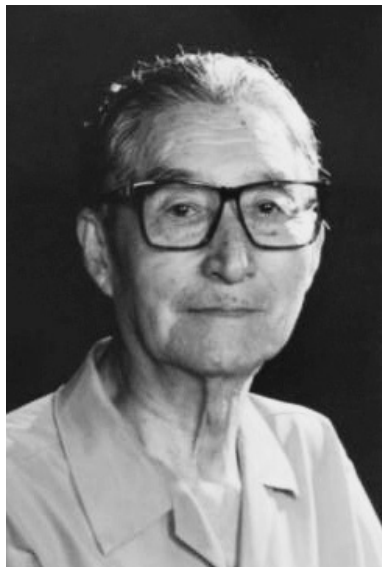
■ 启功（1912—2005）

的协作始自1972年父亲被邀请参与启功先生负责的标点《清史稿》的工作。他们有诸多共同爱好：《红楼梦》研究、文物鉴定和书法。二人友谊持续40多年，中间交往完全不受启功被打成右派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至启功先生去世，向他求字的人何止千数，清华的人也不在少数，可能由于父亲的关系，他更予以关照，我在不止一位清华老师家中看到他的字。时任清华党委书记陈希同志也与启功有过书法上的交往。2004年冬，陈希到北师大看望病中的启功先生，二人还有过关于“清华园”题写的讨论。

启功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十分幽默，每次见我都说：“大弟（我的小名）先生您好。”我也回答：“大教授（当时是副教授）您好。”

单士元（1907—1998），文物专家。北京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曾任故宫博物院办事员、科员、编纂、副院长，中国营造学社编纂兼中法大学教授。1924年底参加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被批准继续留院。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胡适主任的学生，治中国历史及金石学，主攻目录学和明清史。1930年任职院内文献馆，是我国历史档案事业创建者之一和中国古建筑早期研究者之一，是最早提倡建立档案目录学的学者。1931年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补《清史稿》之缺。1937年出版完成中国首部编年体建筑史工具书《明代建筑大事年表》。



■ 单士元（1907—1998）

单士元先生博学强识，是蜚声中外的明清史专家、档案学家和古建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故宫博物院建筑研究室主任、副院长、研究员。

因他的哥哥去世早，单士元常来探视我的邻居和朋友、生活艰难的侄子一家，因此我们常见面。他嫂子一早起到北京肥皂厂抢装箱剩下的肥皂，价格极

低，再走街串巷，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卖出，作为家中唯一的生计。但一家人有志气，不受他人资助。我母亲经常购买，在家中囤积了3年的肥皂。单士元都知道这些情况，对我说：“你母亲是好人。”单士元嫂子家只住一间小房，还经常交不起房租，当时严禁乱搭棚子，也没有地下室可住。彼时单士元正在主持故宫维修，找片空地搭个房子是很容易的，可能他从未考虑。

老舍（1899—1966），满族正红旗人。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1918年，老舍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回国后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1934年到山东大学担任讲师，其间，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老舍与其他爱国作家一起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文协”正式成立，老舍

当选第一届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1941年，老舍还前往昆明对“文协”云南分会进行考察和指导，并在西南联大进行了4次主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

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通过北京龙须沟的今昔巨变讴歌新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描述北京今昔对比的作品，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1957年剧作《茶馆》问世，被评论界誉为话剧民族化的胜利，艺术性的高峰。我父亲用他赠的票带我去看过一次，第二次我一个人去，能到后台，见了饰演王利发的演员于是之，说：“解放前我家边就有茶馆，老板和您演的一模一样，您干过吧！”

1980年，《茶馆》先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瑞士演出，当时我在法国。演出盛况空前，国际影响很大。我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的同事说他去看过，虽然只有法文字幕，但一票难求。我虽有工资，但要上交，真想去巴黎



■老舍（1899—1966）

歌剧院再看《茶馆》，可惜囊中羞涩。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1978年6月3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父亲吴恩裕教授抱病参加。老舍去世后，我听到父亲与启功、张伯驹多次谈起，他们认为老舍幼年吃过苦，工作后也不顺心，饱经沧桑，历过患难，而且对人生深思熟虑，并写入作品，不受大折磨，应不至于自杀。而且太平湖并不是距老舍家迺兹府最近的水域，投太平湖，有否“舍我求万世太平”的意思呢？我想“是的”。

我家距老舍故居很近，见过老舍几次。他个子不高，和蔼慈祥，但从眼神中就可看出十分自信，他对人的尊严的看重是10多岁的小孩都看得出来的。自1949年参加首届文代会以来，他和父亲来往很多。我有时想，为什么纪念我父亲的文章只有茅盾的，而没有老舍的呢？原来他早已离世。老舍的书还在，精神永存，也影响了后代，我和他的长子舒乙后来成了朋友就是明证。那些迫害老舍的人，不管年龄长幼、有无意识，有没有回想过给人民带来的损失以及自己的罪责呢？

钮茂生（1939—），满族，出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水利部部长、河北省省长，第十届全国

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2002年，河北省省长钮茂生借鉴清华大学与深圳市的合作模式，积极推进设立厅级事业单位“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成为最早与河北省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双方充分发挥和利用各自的经济、科技、人才、市场、信息优势，共同推



■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左）与河北省省长钮茂生（右）

进学校科技教育事业和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河北省省长钮茂生和清华校长王大中任理事会理事长，河北省副省长才利民、清华副校长何建坤、清华党委副书记杨振斌任副理事长，清华科学技术开发部主任周立任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院长。2023年12月，研究院总部落户石家庄并与市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可惜我已在雄安新区工作，未能参加。

金志扬（1944—），满族，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二中，北京足球高级教练员。我与金志扬是北京二中同级同学，都曾列入北京二中校友名人录。他1973年在北京队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后退役。1973年12月至1974年12月任北京足球队教练。1981年至1983年任北京二队主教练。曾率北京足球二队和清华大学足球队（北京市甲级队）比赛。1991年至1997年任北京国安足球队主教练。1996年、1997年夺取足协杯冠军。1997年至1998年任中国男子足球队教练。2001年，金志扬以助理教练的身份协助国家队主教练米卢率领中国国家队从世界杯外围赛出线，进军韩日世界杯，是中国足球队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我自2003年被国防科工委聘请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领导与北京理工大学领导熟悉，促进已从北京足协离职的金志扬于2003年8月被北京理工大学聘为教授、主教练。



■ 金志扬（1944—）

郎平（1960—），满族，奥运冠军，中国排球学院院长，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女子排球前运动员、原总教练。

1973年，郎平进入北京工人体育馆少年体校排球班。1976年，进入北京市业余体校，后入选北京市排球队。1978年，被我的朋友袁伟民教练看中，入选国家集训队，获第八届亚运会女排比赛银牌。1979年获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1981年，随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获“优秀运动员奖”。1982年，随中国队获得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并荣膺世界女子排球锦标

赛“MVP”。1984年，随中国队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比赛金牌，协助中国女排实现三连冠。1985年退役。1995年被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1999年开始，郎平远赴意大利执教。2008年，北京奥运会，率领美国女排夺得银牌。2013，郎平被任命为中国女排主教练。2016年，带领中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2019年，率领中国女排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2001年，她担任形象大使，我任奥申委主席特别助理，北京申奥成功后我们合影留念。她与我开玩笑说：“我任教练，美国女排也打不赢中国队。”



■ 2001年为北京申奥时，吴季松在莫斯科与运动员代表们在一起。左一郎平，左二吴季松，左三黄志红，左四王治郅

2002年郎平入选排球名人堂，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16年当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2018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颁授的改革先锋奖章。

2016年9月5日下午，“自强时代，自信中国——中国女排清华行”活动在综合体育馆举行。从里约奥运会载誉归来的12名中国女排队员亮相清华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一行专门到二校门前迎接。清华向女排赠送了郎平在“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标语下拍摄的老照片。

从城里乘驴车、骑自行车、步行到清华的往事

今天，从西直门到清华是小学生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从西直门乘地铁13号线10分钟就到了五道口，入清华前后不到半小时。但在100年前，我父亲吴恩裕16岁时，千里迢迢从沈阳乘火车赶到北京去清华看一眼他敬仰的大师，却十分困难，甚至最后不得不乘驴车——要一早赶到西直门，叫上“拉脚”的农民赶的驴车，走7.5千米，花3小时才能到清华学堂，如赶上雨天泥泞或车出毛病则要走半天。

1925年父亲吴恩裕来北京看清华大师

1925年，刚过16岁的父亲利用他在东北大学预科入学前的暑假，只身第一次来到北京，寻求进步和光明。受五四运动影响，父亲拿他即将在《东北大学校刊》发表的文章——已为周天放、梁漱溟等名师赏识的《为研究哲学者进一言》，请求大师指点。

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管理得有序，从沈阳很顺利就到了北平，但到了北平之后，不知道怎么去清华。虽1919年清华已有校车往返进城，但因军阀



■ 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没有集装箱卡车，只有马车在土路的尘烟中运货

混战，治安不保，时开时停，最后只得乘驴车。

民国期间北平的公共游览汽车事业起步较晚，直到1947年才开通了从北京城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此前若前往颐和园、圆明园等处，除了乘坐火车，便只能在城内租赁汽车或至西直门外租赁马车、驴车、骡车或者骑驴。

到1935年，驴车无固定路线，比较自由，价格为“二点钟一元，逾一小时加三角”，许多教授包括朱自清等人都多次走此线。乘坐马/驴/骡车速度慢，用时长，后来被人力车和汽车淘汰。

父亲说当年平安里是车站，有一些破旧的公共汽车去清华。平安里当时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大土岗，破旧的公共汽车都停在上面。车票贵，又不准时，只得在尘土飞扬中等待。在雨天泥泞的土路中难以行走，车轮卷着泥开。车辆年久失修，有的车发后还没出西直门就抛锚，走不了，只得返回。听说坐毛驴车反而更保险，于是他就乘拉脚的毛驴车从西直门一路到清华。

父亲曾多次与我回忆起当年的北京，尽管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已13年之久，但正值军阀混战的年代，北京除了拆除东、西皇城根的皇宫外墙，缩小了原紫禁城的范围以外，没做任何实事，与清末败落的北京没有什么变化。在先农坛、天坛以外和陶然亭、龙潭湖一带全是沼泽和荒地，今天的南菜园就是真正的菜园，农民种菜挑去城里卖，而白纸坊和北京体育馆一带都是乱坟，夜里没人敢走。就连北京内城的东城和西城在北、东、西三面城墙以内近百米的地方



■ 吴恩裕刚到北京时见到的前门后的“瓮城”（现已拆除）

都是空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也有大片的空地。16岁的父亲见到他仰望的北京是这般情景，大失所望，但来看大师、找真理、进清华的热情并未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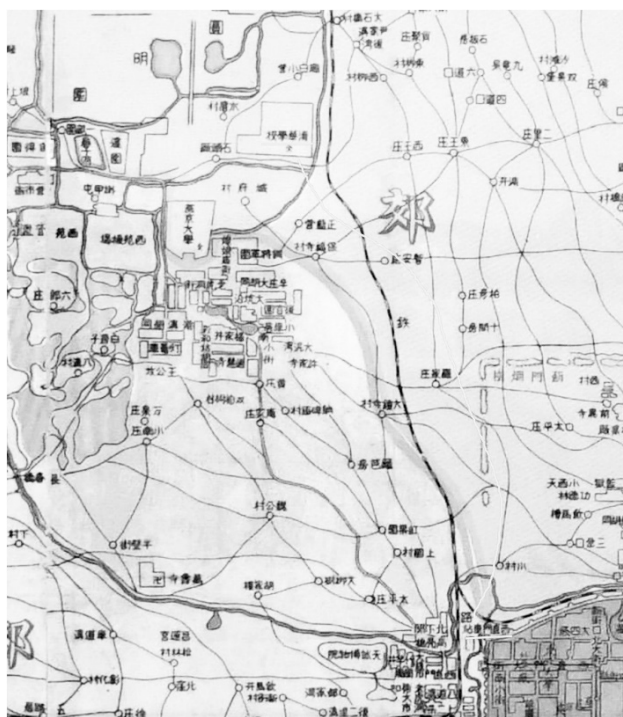
1930年父亲考入清华大学

来清华观光后坚持努力5年，1930年，父亲如愿以偿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每年只收几个学生），因成绩优秀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于是他举家于1930年初夏从沈阳迁北平，住西单旧刑部街34号后院。当年这是清朝政府刑部所在地，是北京西城的著名胡同，2000年我去寻访时已荡然无存，眼前只有广阔的长安街，往事如潮水般向西而去。

上驴车幼儿园

当时，家住在城里，而父亲自己每周往返，赴清华上学。20世纪30年代，出西直门外，仍走的是5年前那条路，穿过村庄和农田，经大钟寺、双榆树和黄庄，直插海淀镇。1948年，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海淀、清华一带已有解放军。父亲仍去清华和燕京大学（后为北大）看朋友，在我一再要求下，带我同去。当时仅有的几辆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早已停运，只得恢复到30年代初乘农

■ 红线为1925年吴恩裕教授乘驴车从西直门赴清华的路线，至1948年父亲带我去，23年间基本未变，可见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摘自1934年《北平四郊详图》）



民赶脚的驴车去，这对我是头次经历，当然是大喜事。乘驴车慢慢悠悠可看风景，车老板防晒的包头布（戴军帽怕被风吹跑）已经从白变灰，但谈兴不减，说的是河北话，我不太听得懂。当年城墙以外全是河北，农民都说河北话。大意是：“要打仗了，没人出城了，挣不到钱，一家老小吃什么好。”父亲给加了点车钱，他千恩万谢：“贵人，今天遇见贵人了。”我的理解，多给钱就是买东西贵（贵贱的贵），也不错，学了点东西，算是上了驴车幼儿园吧。我和父亲说，回来还找这个赶脚的吧，父亲对我说，等一个小时要加三角钱，等半天，太贵了。赶脚的急忙说：“现在拉不着活，我等你，不管多久，一共就加三毛吧。”

物是人非，挺立的双榆树仅留下地名

当年从西直门到海淀镇有一条直线的斜路，主要在农田里穿行，生生轧出了一条路。出了西直门再无高建筑，现农科院——当年日本建的农科所三层小楼就是显眼的大厦。一路上两边都是庄稼，也有坟冢，有的还立了墓碑，到了这里车夫都要加快几鞭。还有小村落，“双榆树”就是一个。村前真有两棵大榆树。再向前就是斜的海淀街。一路只有十几公里，大约要走3个小时，到了朋友家就该吃午饭了。

30年后，20世纪60年代我上清华时还走过这条路，路已断断续续，不少部分是被踏平的田埂，看来还有人走。今天，这条小路连带那时的村庄和农田都不复存在了，代之以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和柏油的马路。仅存的是现在海淀镇南直对黄庄的斜街，就是当年那条路的北端。经这条路到海淀镇东，再过中关村折向东北入现在清华大学西门，就是父亲当年的求学之路。

1962年我上清华后，重走父亲乘驴车去清华的路线

1962年考入清华后，我对1948年父亲带我乘驴车来清华的路线已记忆模糊，报到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决定重走这条14年前的路线回家。

这次是出已开的清华南校门，驴车是没有了，但还很轻易地找到了原路。途经“双榆树”，当年还真有两棵大榆树的残根，大概是大炼钢铁时被砍掉了。可地名没变，是公交车的双榆树站，真是物是人非。

走到元大都城墙遗址处歇歇脚，忽然上来一个流里流气的人对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是清华大学学生。”他说：“不是吧！是特务！这么乱的时候

候（指三年困难时期）这么晚，清华大学学生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你是谁？来管我。”他说：“我是民兵，正管你。”我说：“假冒的吧！为什么没有袖箍（当时的确较乱，民兵都戴红袖箍）？”他说：“忘家了。”随后摆出一副要动手的架势，我是摔跤三级运动员，自然不含糊。他说：“你敢动手，这里我一呼百应。”我说：“我绝不会先动手，我是学生没有钱，你把全村人都叫来也不怕。”他和我对峙了两分钟，悻悻地下了土坡。

在这条夜路上我看到了现实，算是出了“象牙塔”的一次社会调查。14年过去，此前和父亲坐驴车时遇到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是没有了，但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农民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面黄肌瘦。刚见的地痞倒是不瘦，看来是四处骗吃骗喝，有机会就打一次小劫。

后来听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司机师傅说，他遇到过一次伪装警察劫车，两个穿警服的人站在八大学院的路边持手枪（应是假枪）举手让停车。刘冰有战斗经验，让司机冲过去，假警察慌忙蹿下公路，跑进树林，当时更没敢开枪。这个故事当时在清华流传很广，不知有否演绎的成分。

上清华后，每周末先到香山汽车总站为父亲取换洗衣服

1951年我才7岁，刚上小学就多次随父亲去香山进行曹雪芹生平的实地调研，小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好不容易到了香山。那时还有残存的日本鬼子建的圆柱形炮楼，我亲眼看到了抗日战争的遗物，现已荡然无存。远处还有方柱形碉楼，当时以为是“高级炮楼”，听父亲讲才知道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为镇压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练兵修的模拟碉楼，使我又了解了些清朝的历史。当时香山脚下有一片片水塘，就是我后来研究的湿地，有许多鸭子在游弋。父亲说，北京烤鸭要用香山脚下泉水养的鸭子做食材，松枝烧烤才正宗。两种材料都取自香山。香山有特有的白皮松，梅兰芳的香山别墅前就有一棵康熙年间留下的古树。我工作后每周抽时间爬香山锻炼，老树还在。现已20年没爬了，不知道老伙计还在吗？

寻访曹雪芹香山故居

为了实地考察和集中研究，父亲在1962年居然搬到香山镇现在的买卖街最南端的一个农民小院中住下。这个小院就在今天北距香山饭店大约500米、上山的坡上。当年这里无房子遮挡，农田下可以直接看到后来被发现的曹雪芹故居，



■ 曹雪芹香山故居 吴季松摄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植物园中的曹雪芹纪念馆。开始父亲并不知道曹雪芹故居就在这里，天天早出晚归，徒步寻访考察。当地 80 岁的老农说祖辈口口相传，曹雪芹就住这里。隔了两个世纪，他居然与曹雪芹故居为邻，也算历史的巧合吧！

农妇张老太太

记得小院的主人姓张，是个 60 岁的农民老太太，也知道这则轶事。父亲住在 10 平方米左右的东房，白天出去考察，晚上回来整理资料，自己生煤球炉子，常吃的饭是炸酱面，自己擀面、炸酱，张老太太卖他一点青菜。当时的买卖街不像今天店铺林立，住户都是农民，肉要从当时街上唯一的小肉铺买，父亲几乎是镇上仅有的几个主顾之一。我至今记得我替父亲买肉时，小老板十分客气地说：“应该您来买，一个大教授能住这里就出奇了，还能自己来买肉？”我说：“他连饭都自己做。”小老板大吃一惊：“自己做？不请张大妈做？”记得当时肉是 5 角钱一斤，小房一个月的房租父亲给 5 元，这对当时的孤寡农民老太太来说是一笔“横财”了。每次父亲交房钱她都千恩万谢，仿佛是收礼一般。她常对我说：“谢谢吴教授，我买油有钱了，不逢年节也能吃上点肉，这是社会



■ 右眼失明的吴恩裕教授在题写有关曹雪芹文章的题目

主义的生活了。”

“坐末班车有危险”

我当时正在上大学，每周六从清华回家，星期天返回时，先乘 331 路公共汽车去香山给父亲送换洗衣服和日用品，然后返回清华宿舍，每次坐的都是末班车。当时的车站就是现在的地铁站，是一片土地，车一到就一片烟土扬起。我坐上车，四周一片漆黑，居民的灯光如天上的星星寥寥无几。每次末班车只有我一位乘客，司机、售票员都认识我了。我一上车他们就问：“又看爸爸来了？这是你的‘专车’。”有一次女售票员偷偷告诉我：“有一次到终点站了，一个乘客还不下车，我以为是睡着了，一叫，原来人没气了，身上还有血迹，吓死人了，马上打 110 报警。幸好警车来得还算快。以后你别坐末班车了，有危险。”

1954 年 7 月 15 日，颐香路开通，香山公交场站正式启用。331 路由颐和园至香山。2018 年 10 月 14 日，因有轨电车西郊线建设，香山公交场站腾退，结束了 64 年风风雨雨的历史。



■ 1962年后我每周往返一次的香山公交车场站，现已改为地铁站（上山地面部分）

5岁参加开国大典，65岁又上观礼台

70多年前，我才5岁，就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我清晰地记得，1948年11月我才4岁半，受做地下工作的姐姐的安排为地下党传送情报小纸条，也算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了，我怎么能不去呢？

当然，没人请我去。我知道下午3点半开国大典正式开始，10月1日，我吃过午饭就离家从北池子穿南池子到南池子南口去参加开国大典。我到的时候已经人声鼎沸，前面站着大人，什么都看不见。但我一直到晚上9时仪式举行完才离开，算是10万参加开国大典民众中的一员，也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我后来在清华的老师滕藤（1930—2023），因有幸在天安门前游行队伍的第一排而被拍下来，年仅19岁，留着当年样式的小分头，意气风发、跳跃欢呼，至今被无数次播放，成为历史的镜头。他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教委副主任。



■ 滕藤（1930—2023）参加开国大典

陪张维和滕藤两位校长游巴黎

1990年，滕老师和张维老师联合推荐我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常务副代表，先在教科

文中国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后来滕老师和张先生都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执委会中国委员，到巴黎开会都由我陪同。游巴黎自然我是向导。滕老师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要去看纳粹占领巴黎时希特勒住过的、至今很少有游客的凡尔赛后宫。张先生最感兴趣的是建筑，要去法国大革命被烧毁的杜伊勒里宫，说：“自己也烧自己啊！”

到开国大典会场设计张仃大师家

从我家到南池子南口的路上，路过参加开国大典现场布置的中国著名画家张仃的家。张仃（1917—2010），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芳山镇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务。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协会徽，负责并参与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担任博士生导师。



■ 张仃（1917—2010）

张仃在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间画室，条件很差，大概为散油墨气，每遇晴天都开着大门。我上北池子小学天天路过他家，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有的画还摆在门外，我经常驻足观看。张大师十分和蔼地说：“喜欢画，可以进来看。”我们交谈，“啊，你父亲吴恩裕教授我知道，我也是辽宁人，我们是老乡。你要愿意，长大了学美术吧！”自我上中学后再不路过他家，日久也忘了这位“老朋友”。后来在清华听说他任教，曾去看过他，被告知他年事已高，很少来学校，已经不住北池子了。

现场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国歌

开国大典奏的是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与我家也有密切关系，我挤在人群中听到十分激动。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是由我姨父高崇民等为负责人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的。从1931年开始到东北抗联之前，开创了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这首歌，在 14 年的抗战中激励了无数抗日志士。

1949 年 1 月，我的大表哥高存信（1914—1996，1955 年授开国少将）率炮二旅进入北平市区。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宣布命令，高存信任受阅特种兵总指挥。受阅的炮兵团长田申是田汉的儿子、黄埔十六期的小师弟。阅兵要奏乐，田申和高存信建议奏《义勇军进行曲》。确定后高存信首先得知，立即打电话给田申，田在电话中激动地大喊：“我爸爸知道了该多高兴啊！”高存信大笑：“孩子。”一告一答说明这些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战士的童心，我想这就是“初心”。

我挤在人群里从缝隙中看到观礼台，想着有一天我能上观礼台。

15 年后，我在首都民兵师受阅

1964 年，在清华大学参加首都民兵师训练的补助是每天半斤粮票，尽管没有儿时那样惊喜，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的岁月里，也觉得有百斤之沉。后来听到，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北京某大学游行队伍训练的补助已达每天 60 多元，是北京市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按工资折算相当于当年的 7 角钱，如果当年真补了 7 角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祖国于半个世纪中物资丰富的变化，可以从这里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60 年大庆在观礼台上的一天

200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那天，是我如了 60 年前“夙愿”的一天，也是十分忙碌的一天——上午上观礼台看阅兵，晚上在观礼台看晚会和焰火。阅兵早 10 时开始，要求早 8 时半到场，到 12 时半结束，足足站了 4 个小时；晚会晚 8 时开始，要求 7 时到场至 9 时 40 分结束，间或能坐一下，也站了两个半小时，一天站了 6 个多小时。但由于心情的激动，当时丝毫不觉得累，这是我大半生中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也是我思绪纷飞的一天：站在观礼台上等待开始时，我想到了过去。1959 年，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我参加游行；1964 年，没有阅兵，我作为首都民兵师的一员参加游行，算是仅有的武装人员，那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自己能站在观礼台上。

我站在观礼台东一台的西北角，前面是群众与鲜花的海洋，回头就是天安门城楼，整个人仿佛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激情澎湃，时间跨越了 65 年，甚至

更远；空间则跨越了我到过的占地球面积五分之四的一百多个国家。

标语从“庆祝国庆”改为“国庆”

自高小学了语文后，每逢十一看到“庆祝国庆”的标语，就觉得语义重复，“国庆”就可以了。据说中央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经毛泽东批准，口号改为“国庆”。

40年后我到水利部工作，负责水生态与环境工作，我认为“生态环境”这个词也有问题。“生态”是自然生态系统，“环境”是人居环境，属于自然生态大系统的子系统，与河北省在国内不必用“中国河北省”类似。

我没有查到有人给出过“生态环境”的定义。从中文来讲，“生态环境”这个词类似于“庆祝国庆”，语义重复。实际上，“生态系统”包括了“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是客观存在，而生存环境是人对生态系统状态的感觉和认知。

费尽周折，我打听到“生态环境”这个概念是黄秉维院士的创意。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他，请教说：“黄院士，听说‘生态环境’这个词是您创意的，您能给我讲一下它的定义吗？”

黄院士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个语义不明的词，还没有定义。不过我可以说一下它的来由。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国务院领导主持的宪法修改讨论会。草案中有‘遏制生态系统蜕变’的说法，我提出，‘生态系统的蜕变不一定对人类不利，不能以遏制一言以蔽之’。例如，河流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形成就是生态系统的蜕变，但是人都住在那里。似乎应该提‘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词因此沿用。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生态环境’是个尚没有明确定义的词。”

当时时间十分仓促，我求知后并没有多考虑，也没有想到这个词居然产生了今天这样的价值。黄院士已是故人，他的科学态度和高风亮节让人肃然起敬，值得我们每一个“环境”与“生态”工作者学习。

我提出“生态环境”这个词的问题后，水利界领导向中央反映过这一问题，中央领导还专门召集专家研究过（当时我出国），也曾征询过我的意见。我明确表示：“生态环境”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深入人心，起到了提倡“可持续发展”新理念的积极作用，没有必要改变。但对它作出确切的定义是必要的。

至于“生态环境”的定义，如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的概念相对应，“生态环境”的定义似是“在人与生物圈中，自然生态系统的状态”。我的良师益友“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对我提的这个定义很肯定，他说：“科学名词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义，才能进行有效的科学研究。”

清华学子种京西稻、保京西稻

2025年国庆期间，“稻田音乐季”在海淀区上庄镇千亩京西稻田中开幕，把人们的视线带到古老的京西稻上。京西稻不仅记录和见证了北京生态的变迁，也引起我60年前种京西稻、20年前保京西稻的回忆。

我种京西稻和今天的腿病有关系吗？

京西稻又称“御稻”，是北京西郊地肥水美的万寿山、玉泉山周边生产的优质稻米。300多年前，由康熙、乾隆皇帝亲自选种培育，在玉泉山、颐和园周边的北坞村、六郎庄、万泉庄、上庄的白水洼和梅所屯等地种植。康乾年间有1万多亩。1952年玉泉山下的水稻亩产300千克，比1949年翻了一番。

自1962年9月起，我一入清华大学就在上庄公社白水洼村参加秋收。金黄



■我曾插秧收稻，并建议保留的海淀上庄京西稻田

色的稻穗布满了田野，沉甸甸的籽粒从绿色的稻叶中显露出来，像一层金色的粒子洒满大地。秋风吹来了特有的稻香，沁入我们这些城市小孩的心脾。千亩水稻，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国庆节一过，社员们早就盼望的一天——开镰割稻的日子来到了。200 多户社员，家家磨亮了镰刀；供销社的业务员，送来了装粮的麻袋和草席。大家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沉浸式”的，沉浸在人类的本能劳动中体验幸福。

载满清华学生的车一过海淀镇，就是一片水田棋布、溪流如网的江南风光。稻禾在几天内由葱绿变成翠绿，由翠绿变成深绿，直到金黄，等待我们开镰。

从种稻到收获是个 200 天的过程，我们只参加其中的几次，而农民要守着 200 个日日夜夜。当时机灌设施少，效率低，若遇大旱真是“农夫心内如汤煮”。水稻是否能按季节插秧，决定着秋天的收成。农民叫雨水为“立水”，北京有个地方叫“立水桥”；农民管泉水和井水叫“横水”，也灌不饱水田。他们把水渠、电井和自流井全都利用起来，昼夜不停，使稻田里始终保持着一寸多深的长流水。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京西稻插秧收割都离不开人。每到农忙时节，从玉泉山下到海淀山后，来自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和城市的义务劳动者都会参加抢收抢种，我就在其中。

1957 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北坞村丰产试验田视察。当晚，总理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用了晚饭，人们欣喜地告诉总理：“京西稻如今已成为群众的普通食粮。”

在北京上庄南沙河湿地种稻、捞鱼，挖京密引水渠

1964 年，清华大学与中央和北京的很多单位混编成立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以大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为主，开赴北京郊区的区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我被编入上庄工作团的梅所屯工作队，在北京海淀区上庄公社的白水洼村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为“三同”。今天，“四清”和“三同”已成为“历史名词”。

1943 年，大洪水曾使南北沙河间一片汪洋，水已漫到屋墙，人们上房顶躲避，幸好 3 天后水退去，否则死人无数。但退水后造成许多房屋倒塌，又值日

寇占据，无人救济，许多农民流离失所。1965年，当地老人仍记得“大洪水那年”。

我去时南沙河已干涸，中心流着废污水，但地下水仍然丰富，多村种京西稻，打井抽水浇灌，我参加插秧和收割劳动，那真是“头上汗滴禾下土”“出水才见两脚泥”。唐诗和成语都不用背，有切身体验，听一次就记住。在早春4月插秧，水温不到10℃，那时连长筒胶靴都没有，卷起裤腿站在冰冷刺骨的泥里。我现已过耄耋之年，身体基本健康，但右腿行走不畅，除受过伤外，当年插秧也许是成因，中医说青年积塞，老年显病，是有道理的。

白水洼在海淀区但紧邻昌平区，当年是个幽美的小村子，在一片湿地之中。村前确实有一洼水，算不上清澈，但也还可见底，更使小村显得宁静、清幽。“四清”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早晨起来要训练民兵，白天要参加劳动，插秧、施肥和收割都参加。当时梅所屯农民一年最能开荤的时候除了春节，就是秋末的“淘塘”时段。村前有个小水塘，有七八百平方米、一亩地的样子，到秋天塘鱼就很肥大了。所谓淘塘就是组织人用绳子拴上水桶，连续不断地向外舀水，这可真是力气活，塘深1米多，少说也有1000吨水，全靠人力舀出。当时地下水位很高，如不快舀，下面还往外渗，一般要全队几十个棒小伙筋疲力尽地干大半天，才能把塘水舀干。剩下的就是由妇女去捡鱼，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可以一连几天大吃鱼肉。

当年，我还参加过修京密引水渠的高强度劳动。京密运河是1965年从平地挖出的一条人工河，说“人工”是货真价实的，挖河几乎没用机器。运河工地十分壮观，连绵几十里都是帐篷，几个人住一顶帐篷，席地而睡、日夜三班挖河，一天24小时只有干活出大汗、大口吃馒头和倒头大睡的“三大”，一般人是受不了的。今天多数的农民工也无法适应当年的劳动强度，从十几米深的河底把装300斤土的独轮小车从跳板推上地面，在最后筋疲力尽的时刻，稍有不慎压不稳把，就会连车带人翻下去，折臂断腿。我干这些活不比农工差，赢得了尊敬。

2000年，我作为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调配全国水资源）兼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支持制定、指导实施的《首都水资源规划》改变了种植结构，让

低收入的、以稻米为主要产品的种植结构改变为中草药种植和特种绿色食品如冬枣等的种植。农民对我说，不用早春插秧，救了妇女，妇科病大大减少。尤其是年轻的妇女十分激动，妇联曾筹划给我送匾牌，我事先知道后全力阻止，说：“我家房子小，没地方挂。”在 21 世纪送匾而不是感谢锦旗，也算成小传奇吧！

以生物多样性理论保京西稻

一亩水稻需七八百立方米的水，用水量是其他大田作物的两倍。2000 年，北京严重缺水，为备战北京奥运保护水资源，市政府宣布京密引水渠不再供应农业用水。从 2001 年开始，该区大裁京西稻。

当时我认为京西稻是稀有物种，更是稻米名牌，可以栽面积，但绝不能停种。

2000 年，在《首都水资源规划》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北京缺水，不适合再种稻，要把京西稻田全部去掉。北京的确缺水严重，但京西稻是从三国曹魏时期开始栽种的传统优良品种，是稻中的“大熊猫”，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看，必须留住这一物种。至于移出海淀的原产地，不在当地的小水土生态系统中，品种一定会退化，而且保留不能太少，要构成一个小生态系统。因此，虽然海淀地价高昂，但京西稻必须保留，我以此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北京市政府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上庄保留了京西稻。

2015 年，海淀区仅在上庄的东西马坊村、上庄村和梅所屯等地保留了 2000 亩京西稻田。

现在京西稻在海淀保留了 130 公顷，达到构成最小生态系统 1 平方千米的标准；年产 750 吨，口感较黑龙江五常大米还好，产量也足以作为一个稻米品种营销，每斤 10 元；富裕了种植农民，可谓一举三得。

作为三山五园地区不可或缺的景观，京西稻不能消失，现已成为海淀区农业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和特色产业。我 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6 月参加了 10 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的住地——海淀区上庄镇是京西稻的核心种植区。

1997 年 6 月，京西稻首次走出国门出口日本，受到当地市场的欢迎。仅一年多时间，京西稻出口数量就从最初的 53 吨提高到 1000 多吨。